

# 关于“成都战役”几个问题的探讨和考订

余 渊

(成都军区 政治部编研室, 四川 成都 610011)

[摘要] 1949年12月发生在成都西南部的解放战事,被命名为“成都战役”不够确切,似可命名为“成都西南战役”。中央军委和二野、十八兵团指挥员准备在川西地区打一次大战,以歼灭国民党残军,但国民党军队却迅速溃逃,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此外,与成都解放相关的一些史实也有探讨、考订的必要。

[关键词] 成都战役;考订

[中图分类号] E297.4;K26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0)03—0014—06

1949年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解放后,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和第十八兵团等部,向川西进军,解放四川省会成都的任务提上日程。1949年12月6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等关于目前部队情况和下一步打算致中央军委等电中指出:部队在占领“铜梁、大足、内江……特别是占领乐山截断了敌人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后,即可休整10—20天,作好充分准备,然后西出成都,以“协同第十八兵团聚歼胡宗南”[1]。要求第三兵团的第十、十一、十二军,第五兵团的第十六、十八军,休整后分别从东、东南、南几个方向同时向川西推进。同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下(贺的任职是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3日在致彭德怀电中明确的,此后贺即以此名义率领第十八兵团等部南进),第十八兵团等部迅即由陕、甘向四川出动。12月中旬末,第三兵团的三个军进至成都以东、以南地区,尤其

是第二十军在攻占邛崃、大邑后,即截断了胡宗南集团逃往康、滇的最后一条退路。稍后,第十八兵团等部占领江油、绵阳、德阳,逼近成都。从而使猬集于川西的三四十万国民党军完全成了瓮中之鳖。此后不久,人民解放军与胡宗南集团主力之间,在成都周围特别是在成都的西南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战事。下面,笔者就有关此次战事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 一 关于“成都战役”的称谓

迄今为止,包括一些军史专著<sup>①</sup>在内的史书、文章,都将在成都周围的作战称作“成都战役”。这个称谓是不够确切的。

第一,成都境内并未发生过战事。成都,在中华民国初年,其行政区划为成都县(今市区西北)、华阳县(今市区西南)。1928年正式建立成都市,治地为与原成都、华阳两县的城区,直至1949年成都解放未变[2](479页、492页、550页)。

[收稿日期] 1999—08—27

[作者简介] 余渊,原名袁德全(1929—),男,成都军区政治部编研室 研究员。

①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等书均有这种称谓。

1949年12月,在解放军进军川西期间,成都市除了12月13日晚胡宗南部第三军攻打刘文辉第二十四军驻城南武侯祠的部队,发生过短期交火外,未发生过任何战斗,而后来发生过激战的邛崃、蒲江、大邑等县,当时均隶第一行政督察区(即温江地区),不属成都市管辖。

第二,各类有关辞书,凡涉及战役、战斗的条目,古往今来,约定俗成,通常都是以地名命名的。如古代城濮之战、淝水之战、赤壁之战等等。解放战争时期,几乎所有战役、战斗的名称都是冠地名的,如衡宝战役、漳厦战役、广东战役等等。有的为了更具体一些,除了冠地名外还点出战争的性质,如四平保卫战、延安保卫战等等。再,凡是以大中城市命名的战役,最后几乎都是在城区进行的,如石家庄战役、济南战役、太原战役、上海战役、兰州战役等等。解放军赢得上述战役的胜利,一般都是先夺取外围,而后郊区,再经过巷战占领市区。当然,在双方交战中,对城市的破坏是难免的。用上述战役称谓来衡量“成都战役”这个称谓,就显得名不符实了。解放军进军川西的作战,不仅未在成都城区进行,也未在其郊区进行,怎么能称为“成都战役”呢?坚持现在这种叫法,很容易给历史知识不多的读者造成一个误解,即成都也是经过激烈的战斗、严重的破坏才解放的。

第三,如何正确命名成都周围发生的战事呢?据查,12月15日至17日,二野参战各军从青神、乐山、彭山、新津等地分别渡过岷江后,即向西、西北发展,19日、20日,以彭山西进的第十二军攻占了邛崃、大邑县城。24日,胡宗南集团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率7个军,由崇庆、新津等地分路向西突围,企图冲过邛崃,经雅安去西昌。25日,解放军第十、十二、十六、十八军全力遏阻李部。突围与反突围的战事十分激烈。战况之剧为进军西南所罕见。尤其在邛崃之固驿、大邑之高山、蒲江之西碛等地,李兵团“不惜任何代价,疯狂反扑”;每次用一两个团,“甚至一个师的兵力,借助于猛烈的炮火,用人海战术大面积突击”[3](192页)。敌我双方“白刃格斗,往复进退”[4](138页)。26日,解放军在戡止住对方凶焰后展开总攻。27日李文率5万余官兵投诚。

综上所述,这次以反突围为中心的作战,只是

发生在邛崃、大邑、蒲江地区,而这些地区均位于成都的西南,故似命名为“成都西南战役”较为确切,也能给读者一个明晰、准确的概念。这种命名,在我军战史上是比较多的,如晋北战役、鲁西战役、滇南战役等等。

二 按照中央军委原定部署,是准备在川西地区打一个大战役的

1949年初夏,中央军委擘划的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是二野主力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先进占川南、川东,截断蒋介石在西南最大的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滇之路,然后与第十八兵团等部协同,在川西地区将其聚而歼之。此项方针,在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的5月23日《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6月27日《对进军西北和川北部署》、7月16日《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9月12日《对西南各敌均取包围再回打方针》、10月13日《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5](第五卷591、624、635、670页及第六卷24页)等里面有充分反映。在进军西南过程中,刘、邓、贺诸野战军首长切实贯彻执行了这项方针。在南线,不论在刘、邓等8月19日《进军川黔作战基本命令》中,还是在其后的各项指示中,二野主力“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6],沿着既定方向,按照既定时间,关闭了敌人逃路。在北线,贺龙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先抑留、牵制胡集团,免其迅速后撤的意见,采取了佯攻手段,攻而不急,突而不破。12月上中旬,当二野从南面行将截断诸敌由川入滇所有退路,胡宗南率部由陕、甘向川西撤退时,我南北两路大军以多支箭头、从多个方向,射向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鉴于胡集团尚有近20万兵力,其中一些部队还有战斗力,刘、邓等根据“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力求有准备”[7](1233页)的作战原则,适时作出在川西全歼国民党军的计划:12月18日,刘、邓“为准备协同我十八兵团合歼”“猬集成都周围试图顽抗”的胡宗南等部,对已抵达成都以南的各军重新划分了集结位置,并要求部队在集结地“积极作歼敌作战的准备”。12月21日,当占领邛崃、大邑,截断川康公路后,刘、邓在给前线各军首长的指示中强调指出:“胡

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次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必须十分慎重”,要求“各军应就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整火器,鼓励士气,瓦解敌军”。在战法上,“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的吃”。12月22日,当第十八兵团等部“解放绵阳,正向罗江前进”之时,贺龙等预计“全军约于一月一日均可到达涪江沿线及沱江以北地区之安县,及其以南绵阳、罗江、三台、中江等地集结”。为“配合二野会攻成都”,要求部队“休整五天到七天”,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这些史实清楚地表明刘、邓、贺等首长把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作战,是当作一个大战役来打的。在指导思想,要求做好充分准备,要慎重,不要轻敌乱碰;采取军政双管齐下,积极瓦解敌军;并对作战方法提出了具体意见。

孙子曰:“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8](《地形篇》)刘、邓、贺准备在川西打大仗的战役意图,是有充分根据的。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到了“危急存亡之秋”[9](509页)。其后,在解放军向华东、中南、西北的战略追击中,其残余力量进一步削弱。这时尽管蒋介石也深感“今天黑暗重重,危险艰苦”,形势十分严峻,但一贯顽固不化的他,仍表示要“凭着一线光明的希望……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10](225页)。蒋介石错误地借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认为西南,尤其是四川,有天险、地利和兵源、粮源充足的优势,加上还有他的嫡系精锐部队胡宗南集团的存在,所以,他于8月下旬到重庆主持西南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时,即号召各将领“同心同德,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以争取胜利”[11](306页),制定了“确保西南为目的,以四川为核心,争时待机”[12]的战略方针,并作出相应部署,并拒绝了宋希濂、胡宗南关于“为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至滇缅边区”[11](302页)的建议。直至重庆解放,宋希濂、罗广文部主力已被击破,胡集团被迫撤入川境,情势“危急,已至千钧一发之时”[10](310页),蒋介石还妄图利用由川东撤

下来的残余部队,配合胡宗南的所谓王牌部队,在成都附近来一次大决战。为此,他采取了下述措施:(1)任命参谋总长顾祝同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以胡宗南、杨森为副长官,责成他们拿出一个实施“川西决战”、保卫川康的方案来;(2)亲自给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康实力派做工作,说服他们率部参加川西作战;(3)动员成都耆宿行动起来,协助胡宗南“确保川西”;(4)动员新闻媒介,大造保卫川西的舆论。甚至,在他逃往台湾后,还电胡宗南“固守成都三个月,以待国际局势变化”。

为贯彻蒋介石指示,顾祝同、胡宗南等关起门来“纸上谈兵”,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一、以孙元良部(辖第十六兵团、第二十九军之一九四师、第二十军之第七十九、一三四师,以及第二三五师),除以一部向遂宁、乐至方向攻击,牵制解放军,并掩护该兵团左侧安全外,主力即依现态势,兼程向沱江以西,简阳、资阳一线前进,准备参加主战场方面之作战,并与第七兵团(正向宝轮院以南集结)切取联系;二、以第十八兵团之九十军,即向简阳淮州地区前进,联系孙兵团,侧击简阳解放军之右侧背,兵团另以一部控制南部及三台;三、以第二十、二十兵团余部,截断灌县、彭县邓锡侯部[13](173—174页)。

当然,蒋介石上述种种图谋,只不过是十足唯心主义者的梦呓,最后一切都成了泡影。计划中的战役:原定的三四十万人,到头来参战的只五六万;扬言的“大决战”,变成了单纯的逃跑;所谓的“固守三个月”,实则只挣扎了两天。个中原因是什么呢?第一,蒋介石的川西决战,本来就是建立在空中楼阁基础上的。当时,从军事力量(数量、质量)上、人心向背上看,解放军均占有绝对优势。蒋介石企图以量少、力弱、师疲之旅,抗击兵强马壮、豪气万千之百胜之师,无疑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第二,川境国民党军,在大军压境、所有退路均被截断后,士气十分低沉,将领们深感“大势已去,毫无希望”,“打则没有力量,走则没有条件”[3](452、367页),精神上完全崩溃,毫无斗志可言。第三,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加上蒋介石、胡宗南的先后逃离成都,国民党军内部无论中央系、地方系,还是蒋嫡系,纷纷起义、投

诚,导致全军顷刻瓦解。

最后,再谈一下关于成都和平解放的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对于一个地区或城市的解放,有三种方式,即毛泽东所说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7](1424—1425页)。它只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常见的是其它两种方式:或用战争手段解放,或用和平手段解放。和平解放的形式又有两种:一是长春方式,在解放军长期围困、争取下,迫使守军起义、投诚而后解放;一是武汉、西安方式,守敌在大军压境下被迫撤离。

由于成都不论城区还是郊区,都未发生过战事,城市的一切设施、财物、文书档案均未遭受破坏,所以成都应属于和平解放这种类型。其具体形式,则兼有长春和西安两种情形。1949年12月上中旬,当解放军向川西进逼时,城内的国民党军有两部分:一为胡宗南的第三军(组织成都防卫总司令部),一为地方部队九十五军一部及曾庆集(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十四补给分区司令员)所部,两部在中共争取下正酝酿起义。12月24日,第三军奉令撤出成都,准备突围西逃,该军任城防的第一二三师在我策反下,于24日深夜排除城内爆破装置后,据地下党的指示撤往西郊罗家碾[14](761页)。25日,整个成都市的防卫工作即已被地下党掌握的部队所控制,并出版了《西川人民日报》。当日,该报刊载了解放军总部的《约法八章》和《维护成都市治安的十条规则》。这些记载可以说明:成都自24日胡宗南部撤走、中共地下党掌握局势后,实际已获得解放了。对此,下述回忆可作旁证,“12月25日,成都各界在智育电影院开会,冷薰南(时任成都市长,已起义——笔者)报告了成都和平解放的经过,谈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办法”[3](570页)。但是,由于这时成都西南尚有胡宗南集团李文兵团的数万主力部队存在,它还威胁到成都的安全,因此成都的最后解放日,仍以李兵团被彻底消灭之日——12月27日为准。

### 三 对几点史实的订正

(1)关于蒋介石离渝去蓉的时间及有关问题。蒋介石离渝时间,一些史书、文章认定为11

月29日[15](386页)[16](793页),不确,应该是11月30日。据《蒋介石年谱简编》载:蒋于“十一月廿九日,午夜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当晚睡在机场的‘美龄号’飞机上,三十日晨,飞往成都”[9](658—659页)。对此,《蒋经国日记》记述甚详:29日,“重庆近郊我军已与共军激战。正午,黄桷桠方面已发生战斗。重庆市内秩序异常混乱”,“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下午十时,林园(位于市西郊,蒋介石住地——笔者)后面已枪声大作……故不能再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因沿途车辆阻塞,通行困难,“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日记是当时的记录,属于历史文献资料范畴,应是可信的。

再,《战史》在叙述此事时还称,同蒋一道离渝去蓉的还有“国民政府”要员,也不确实。据《蒋经国日记》29日载:“本日,我政府行政院迁至成都办公。”可见其事发生在蒋走的头一天。又,关于蒋介石到成都约见川康地方实力派的时间,也非一些史书和回忆文章所载的是他抵成都的当日下午,而是在次日下午。这有《蒋经国日记》12月1日记事作证:“父亲下午约见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向传义、王方舟(即王陵基,时任四川省主席——笔者)等谈话。”

(2)关于第十一、十二军参加川西作战的部队。从好些史书、文章相关内容看,都写作两个军的全部,有误。实际上,第十一军只有7个团(缺32师95、96团),第十二军只8个团(每师各两团)。对此,下述资料可作佐证。何正文回忆:“三兵团解放重庆后,除留第十一军三十二师两个团、第十二军一〇一、一〇四、一〇七团担负重大警备任务外”,主力经短期休整,“快速向成都逼进”。郑国仲回忆:潼南整训期间,“军党委确定:三十二师以两个团留重庆守备,以副师长涂学忠带九十四团沿嘉陵江北上,直取南充后继续西进”。何、郑当时分任第三十二师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4](33—34页,66页)。关于第十二军只6个团进军川西的事实,有该军《西南进军总结初步整理》(1950年6月)可以证实。该文写道:“重庆解放之后……我军(欠101团、104团、107团)于12月15日先后由内江、资中之线出发。”

再,对统率第十二军进军川西的主要首长,有

的史书写道：“第十二军在军长兼政委王近山指挥下”解放邛崃、大邑[17](299页)。这是主观臆断。川东重庆解放后，百事待举，百废待兴。为此，第三兵团的首长、包括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军军长和政委的王近山，以及兵团机关在内，几乎全都留在了重庆，第十二军只由副军长肖永银、政治部主任李开湘率领。故该军在进军川西期间，凡以军首长署名上报下达的电报，均只有肖、李二人，而绝无王近山。

(3)在邛(崃)大(邑)蒲(江)等地阻遏李文兵团突围的部队只是第十二军的问题，也有偏颇。《战史》第388页载：李文部突围，“当即遭到第十二军的顽强阻击”。据查，由于李兵团主要突击方向开始是在邛崃，而邛崃是十二军防地，故首当其冲，激烈的战况是发生在该军阵地上。但参加此次作战的绝不只十二军。另外，第十六、十八军参加了堵截，第十军攻占新津后参加了追击。这从杨勇、杜义德12月25日向刘伯承、邓小平的报告中可以得到证实：“甲·胡匪25日子时开始由新津、温江之线总溃退。现我发现者：五兵团一、三、六九三个军刻窜抵寿安场以北地区(已被十六军俘三千)。三十、廿七、九十三个军西窜邛崃、大邑方向(已被十二军俘五百余，十军歼一野炮团)，刻窜抵王泗营、三岔街之线。乙·我以十六军四六师、四七师置中兴场、西来场地区，四八师置复兴场、卧龙场线，十八军五二师今午出寿安场(二十六日拂晓可到)，十军主力出大邑，一部经石羊场转向寿安场以北。十二军于邛崃固驿镇，视情出击。以上各部预定于二十六日四时行动，统一出击，合歼逃敌。”杨勇时任第五兵团司令员、杜义德时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当时受命任川西前线二野5个军作战的总、副指挥。另外，第十一军和由遂宁赶来的四野五十军，也在新津以东、简阳以西担任堵截可能向东突围之敌。

(4)关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李振起义的时间。前者，有关史书均载：刘文辉等通电起义的时间是12月9日。实际上，发出通电的日期是在三天以后的12日，只是电文上填的日

期是12月9日。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第二十四军、九十五军在发出通电之前用一些时间做好起义后迎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准备；二是刘、邓9日到彭县(潘是10日到)后，同汇聚在那里的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就起义电的内容、词句、发表通电的时间等进行反复商讨，“经过一番周折”，才“统一了认识”[18]。直至11日方将电文交到雅安，12日由中共秘密电台发往北京。关于通电不是在9日发表的问题，从周恩来、李克农(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长——笔者)12月11日致王少春(中共派往雅安刘文辉军部进行秘密工作的党员，身边没有与北京联系的电台——笔者)电中，关于“现卢汉已在昆明宣布起义……刘文辉、邓锡侯已失去先机”的内容可以判断，直至11日，刘等起义通电尚未发出。

再，有的史书说刘文辉、邓锡侯7日离开成都时，是“化妆潜往彭县”的，这不对。这有刘、邓的回忆作证。刘文辉在《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写道：我是“乘汽车从大门泰然而出，举止一如平日”；邓锡侯在《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中写道：我“坐上吉普车，同平常一样”，离开了成都[19]。既“举止一如平日”，或“同平常一样”，当然就不存在化妆的问题了。

关于李振起义的时间，一些史书写为12月25日[14](141页)。不确。李振，是胡宗南集团第十八兵团司令官，不属蒋介石嫡系。李退入四川前后，在中共争取下有心投向人民。12月9日，他写信给朱德、彭德怀，表示了“坚决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实行起义”的愿望。其后，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良好的愿望未成事实。甚至到12月25日当川西多数国民党军都宣布起义后，李还没有宣布起义。直至26日，他“与国民党决裂”的宏愿方变成现实。这有电报为证。27日，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在邛崃、蒲江地区全歼胡宗南集团第五兵团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李振兵团在合围圈中，李本人昨有日亲到简阳我军中，电话我们请求准予起义，已令其在成都东南之大面铺集结”。宥日即26日。可见，李振的起义是26日才得到批准的。

## 参考文献

- [1]原件存解放军档案馆。
- [2]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3]回忆四川解放[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 [4]挺进西南[M]. 成都:巴蜀书社,1989.
- [5]毛泽东军事文集[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6]中央军委关于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国民党军作战方针给邓小平等的指示[C]. 1949—09—12.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孙子兵法新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9]蒋介石生平[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
- [10]蒋经国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 [11]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 [12]第四野战军后方司令部关于国民党国防部作战计划致林彪等电[C]. 1949—11—16. 原件存解放军档案馆。
- [13]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七册[M]. 台北: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
- [14]第二野战军敌军工作史[M]. 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内部资料。
- [15]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称《战史》):三[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 [16]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川黔滇康藏地区[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 [17]威震神州[M]. 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
- [18]刘文辉. 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A].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33期[M].
- [19]邓锡侯. 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A].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M].

## Examination and Correction of Several Issues on “Chengdu Campaign”

YU Yuan

(ERO of Political Department, Chengdu Military Command, Chengdu, Sichuan 610011, China)

**Abstract:** It is not precise to name the liberation battles taking place southwest to Chengdu in the December of 1949 “Chengdu Campaign” and it seems that it can be named “Chengdu Southwest Battle”.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ttee of the CCP, the Second Field Army, and the 18th Corps prepare to launch a big battle, to annihilate the remains of the KMD forces, but the latter quickly flee in disorder, resulting in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Chengdu on the 27th of December. In addition, there are some other related issues that need examining and correcting.

**Key words:** “Chengdu Campaign”; examine and correct

[责任编辑:凌兴珍]